

容闳自传

耶鲁中国人

容闳 著

王志通 左滕慧子 译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献给我挚爱的儿子马礼逊·布朗和巴特利特·G·容

这些回忆都是深情的奉献

本书部分图片搜集自网络,版权持有者可与出版社联系,
获取相应报酬。

译者序

容闳是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鲁大学毕业生,被尊称为中国“留学之父”。他的自传性著作于1909年由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1915年,即容闳去世三周年后,徐凤石及恽铁樵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付梓面世,命名为《西学东渐记》。容闳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否认,将其自传命名为《西学东渐记》是最初译者的大胆创作,更是融含了译者的独到见解。

就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而言,他身上承载的不仅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他于1878年将四十种一千二百三十七卷中国图书赠送给耶鲁大学图书馆,所捐书籍有《纲鉴易知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三国志》《康熙字典》《李青莲诗》《大清律例全编》及《大清一统志》等。从所赠书单来看,容闳显有借此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清朝政制之意。与此同时,在写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内姆(Addison Van Name)教授的信中,他多次商讨在耶鲁大学设立汉学讲席教授、捐赠一整套《二十四史》等相关事宜。^① 不负容闳之望,耶

^①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10页。

鲁大学在汉学方面确有成绩,如卫三畏被聘为该校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正是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汉学在美国逐渐欣荣。可见,在容闳推动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绝非单一路径。19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该套丛书的本意是收录那些“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以作认识当下世界的借鉴。然而,在定该套丛书英文标题时,他与杨宪益先生将其定名为“From East to West”,其中“East”不仅指这些中国人,也有指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之意。^①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被收录其中,既表明容闳“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努力得到高度认可,亦表明容闳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这可从英译名中看出。如果仅看到西学东渐之潮,而忽视东学西渐之势,这或许不是编者初衷。有鉴于此,我们舍弃了徐、恽所改译之《西学东渐记》之名,以绕开文化传播路径的“争议”问题。

虽然本书的最初译者之一恽铁樵在自述翻译态度时表示“此书悉照原本意思,不敢稍有出入,致失真相”,但其仍不免受到严复、林纾译文的影响,“于意义虽不背原文,在词句间则时有增删”。又因当时白话文运动尚未如火如荼地开展,徐、恽的翻译仍受文言文影响,故今人读此译本时会略显滞阻。

其后,又有王蓁和石霓所译的两个版本。相较而言,石霓所译的版本更为通俗,但用语不及王蓁译本简洁明快。王蓁译本由中华书局于1991年出版,当时采用更接近直译的书名——《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该书时,又重用《西学东渐记》之名出版。2003年,石霓在撰写《容闳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时,为“更好地把握容闳思想、观念和人格”,开始着手翻译此书。鉴于王蓁译本中少有注释,故她选择边译边注,即在每章后附加

① 参看钟叔河:《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广角》2002年第1期。

几条注释,对人物、刊物等加以引注,还摘要了一些史料,甚至加入少许评注,最后还附录了几篇与之相关的文稿。她以此“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些方便,尤其是史学界外的朋友,借此能全面了解容闳自述”,使译著更具可读性,但因增补了大量附注,原本篇幅不长的著作在翻译出版时累达二十八万字。

为此,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借鉴了她们的优长,既采用王蓁翻译时的简洁语言,做到尽量不拖泥带水,凝练准确;同时还吸取石霓边译边注的优点,包括文字脚注,简单介绍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和指出原文中的错误,以及部分呈现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并采用文字和图片相互配合的形式,以辅助读者理解。本序言无需再循窠臼,对容闳的生平加以简述,也无需对容闳的一生进行评价。凡仔细阅读本书后,读者皆会对容闳一生有详细了解,更会对其性格、思想、经历、抱负和人格等有深入的认识,故在此毋再赘言。

本书是合作的成果,由王志通译注前十二章并负责统筹工作,左滕慧子译注后十章及附录。承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查品才先生的介绍,我们才有机会翻译此书。此外,查先生在排版付梓之前,细心审阅全稿,并做有修改和润色,译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深知自己水平有限,若有舛错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17年2月

序 言

本书前五章讲述了我赴美前所受的早期教育,以及去美国后继续学习的情况。我先在马萨诸塞州蒙森城的蒙森学校就读,其后转入耶鲁大学深造。

第六章从我出国八年后重返故土中国开始。向来被视为西方文明例示的西方教育,如不能使一个东方人的内心本质发生蜕变,当他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时,使其感觉自己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觉得奇怪了么?我的情况确实如此。然而,我的爱国之心与对同胞的热忱都未曾衰减。相反,这些皆因同情心而得以加强。因此,接下来的几章将看到我全身心地倾注于我的教育计划的实践。在我看来,践行爱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是改革和再生,而这也是我自己对中国永恒之爱的表达。

随着中国出洋肄业局的突然撤销,以及已成为中国教育先行者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随之终止。

1872年那批出国留学学生的幸存者中,有几人通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终能跻身于中国治世能人的前列。并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中国出洋肄业局得以复活,虽然在形式上已发生了变更。因此,如今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学生正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涌向欧美,来接受科学教育。

1909年11月

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阿特伍德街16号

目录

- 001 第一章 童年时代
- 011 第二章 少年学生生涯
- 019 第三章 前往美国及最初的经历
- 025 第四章 就读蒙森学校
- 033 第五章 我的大学生活
- 041 第六章 返回中国
- 053 第七章 努力谋职
- 061 第八章 从商体验
- 071 第九章 产茶区的首次旅行
- 083 第十章 前往太平军中访察
- 095 第十一章 对太平军的观感
- 105 第十二章 考察太平县产茶区
- 115 第十三章 谒见曾国藩
- 127 第十四章 赴美购置机器
- 133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回国
- 141 第十六章 奏陈教育计划
- 149 第十七章 幼童出洋肄业局
- 157 第十八章 调查秘鲁招工之事

163	第十九章	裁撤出洋肄业局
175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爱妻离世
183	第二十一章	奉召回国
195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变
203	附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828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位于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西南约四里的一个名叫南屏的小村庄。南屏地处澳门以西，相隔半里宽海峡的佩德罗岛(Pedro Island)上。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哥哥最年长，姐姐次之，我排行老三，第四是一个小弟。如今，我是四人中唯一在世的。

早在1834年，一位名叫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ff)的英国女士，就是来中国传教的查尔斯·郭实腊^①(Rev. Charles Gutzlaff)牧师的妻子。她在伦敦妇女协会的赞助下，怀揣推动印度和东方女性教育的使命来到澳门，很快便创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中国适龄女孩，开始她的传教工作。不久，他们又开办了一所兼收男孩的学校。

恰逢担任郭实腊夫人的买办或家务总管的那个人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父亲的朋友和邻居。我父母正是从他那里听闻郭实腊夫人创办的学校及其情况。也正是通过他的劝导和关照，我父亲才将我送进那所学校。比我大很多的哥哥进入传统的私塾读书，而我却偏偏被父母送

^① 郭实腊(1801—1853)，或译为郭士力、郭士立，德籍基督教路德会传教士。1831年来华，1833年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军随军译员，并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51年死于香港。



私塾

进一所洋人办的学校，这令我大惑不解。确切而言，送我去私塾要比让我就读英文学校更符合中国人的普通意志，同时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需要。此外，在普通中国民众看来，通向仕途晋升、影响力、权力和财富的唯一途径便是科举取士。因此，我只能从理论上去分析父母将我送往西式学校的动机。当时中外交往刚刚起步，他们预料，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外交往的巨大浪潮。他们认为应抓住这个时机，送一个儿子去学习英文，说不定他就可能成为一名高级翻译，进而获得一个跻身商界和外交界的有利地位。我认为，这就是父母将我送进郭实腊夫人的教会学校的主要意图。至于我随后的生活中所上演的一连串事情及其结果，都完全听天由命。上天掌控着我所有的设想和计划，因为一套完整且神圣的因果关系法则决定了这一切。

1835年，刚年满七岁的我，被父亲带到澳门。一进校我就被引至郭实腊夫人面前。她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位英国妇女，在我那天真无邪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的记忆尚还准确的话，她身材修长，体态匀称。美丽的面庞中洋溢着坚定的自信，一双晶莹剔透的蓝色眼睛深嵌其上。方下巴上托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坚毅和果决的性

情显露无遗。她有着淡黄色的头发和两道浓浓的眉毛。总之，她的外貌特征萃聚了巨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

当她走上前来欢迎我们的时候，我见她身着一袭满富飘逸、流畅顺滑的白色长裙(当时正值夏季)，裙子的两袖膨鼓鼓的，宛若两只大球，这是当年的时髦款式。这身服饰衬托出了她的飘逸与高大。

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她的一刹那，我惊愕至极，吓得全身发抖，因为我从未见过这般模样奇特的人和如此怪异的服饰。充满恐惧的我紧紧拽住父亲的衣襟不放。虽然欢笑着来迎接我们的她显得非常和蔼可亲，但我并未对她产生好感。面对这样一个人和周围的陌生环境，我感到茫然无措。说实话，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的乡愁渐渐消逝，对新环境逐渐适应，我完全被她的慈祥 and 同情所彻底征服。我开始将她视若慈母，她似乎对我也特别关照。我猜想，这大概因为我是全体学生中最年幼者，且又远离父母，孑然一人。她让我与女学生呆在一起，禁止我混杂在那还为数不多的男孩当中。

这是我永生铭记的违规行为！它发生在第一学年，那就是我试图逃跑。当时我被禁闭在三楼，楼顶有一个宽敞的阳台，是我和那些女孩子们唯一的嬉戏场所。我们被禁止走出房门到街上去玩耍。男学生都在楼下，有充分的自由出去活动。我常常羡慕他们那样自由，往往在课后偷偷地溜到楼下，和他们一起玩耍。自己单独与女孩子们被关在三楼，我感到实在难受。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偶然地偷偷走下楼，十



19 世纪身着时髦长裙的英国妇女

分冒险地走出了学校，跑到码头周围看了看。那里停泊着一簇簇的小船，它们让我那颗富于幻想的幼小心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为了获取自由，我计划逃跑。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们都比我年长很多，她们中有几个人对我的疯狂计划表示丝丝同情。毋庸置疑，她们对这种禁闭生活同样感到难以忍受。我告知她们我的逃跑计划。她们中年长的六人表示赞同。具体计划是，我独自一人先偷偷溜出学校，到码头去雇一只只有篷的小船，然后大家一起坐上这只船逃走。

第二天早饭后，趁郭实腊夫人用早餐之机，我们瞒着大家偷偷跑了出去，一起挤进那只预先准备好的小船里，火速起程奔向对岸的彼罗德岛。我原准备先将大伙儿带到我家，然后分手，各回各家。就在我们横渡至海峡中途时，我突然感到万分惶恐，发现后面有一只船正快速赶来，其速度超过我们，眼看就要追上来了。即使我们给船夫加钱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双桨船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后面那只四桨快船。所以，当船夫看见后面船上有人挥巾示意时，他便放慢了速度。于是，我们全体被俘，惩罚随之而来。我们先列队在校园游行一周，然后排成一行，我头戴一顶高高的圆锥形纸帽，左右两边各站着三个女生。我胸前挂着一块硕大的方形纸牌，上面写着“逃跑首领”。我们在那里整整站立一个小时，直至放学为止。当时我所受的惩处，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感耻辱的经历。我感到沮丧至极。一些顽皮的同学趁机寻找乐趣，偷偷地朝我们挤眉弄眼，扮做鬼脸。郭实腊夫人对如此惩罚尚觉不足，于是又令人拿来姜脆饼和橘子，在我们面前分给其他同学。

郭实腊夫人的学校创办于1835年9月，它最初只招收女学生。在其后的1835至1839年四年间，即为马礼逊教育社会学校筹备期。该校的部分男生暂时并入她的学校，同时马礼逊社会学校将他们的部分经费分拨给郭实腊夫人的学校，予以资助。这便是我进入郭实腊夫人学校的原因。我是当时最早进入该校的两个男生之一。因男校并入，该校自需临时扩充和调整，所以郭实腊夫人的两个侄女——两位派克

小姐(Misses Parkes)双双来到中国,在学校里担任她的助手。这两位派克小姐的哥哥就是巴夏礼先生^①(Mr. Harry Parkes),后来他因在1864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功绩卓著而被封为爵士,事实上他就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我曾一度有幸在她们的教导下学习。

后来,郭实腊夫人与她的两位侄女主持管理的这所学校解散了,我们只好各奔前程。郭实腊夫人带着三个失明的女孩——劳拉(Laura)、露西(Lucy)和杰西(Jessie)去了美国。两位派克小姐都嫁给了传教士,一位嫁给了维魏林^②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另一位则嫁给了麦克奇牧师(Rev. Mr. MacClatchy)。在伦敦布道会(London Board of Missions)的赞助下,她们又在中国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经我用凸字读书法教郭实腊夫人带走的那三位女盲童学习,直至她们能读《圣经》和《天路历程》(Bible and Pilgrim's Progress)。

我返回家乡后,重新开始我的中文学习。

1840年秋,当鸦片战争尚在进行之时,父亲撒手人寰。四个孩子的抚养重担落在了一贫如洗的母亲肩上。

好在我们有三个人已达到可以助母亲一臂之力的年龄。哥哥从事渔业,姐姐帮助料理家务,而我兜售糖果于本乡和邻村之间。我对生意之事十分认真,每天清晨三点钟起床,直至晚上六点才回家。我每天能净赚二角五分钱,全部交予母亲。大哥已是掌家之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得以糊口而免受冻馁之苦。我贩卖糖果差不多五个月时间。到冬

① 巴夏礼(1828—1885),英国外交官,1841年来华,参加两次鸦片战争。他先后出任英国驻厦门、福州、上海等地的领事,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与领事,1862年受封爵士,1885年病死于北京。

② 维魏林(1811—1896),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1839年来华,1844年在上海创办仁济医院,是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开设的第一所医院。1861年,他在北京开设医院,即是现在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1864年返回英国,先后著有《上海华人医院十一年(1846—1857)年份报告》《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和《北京及其近郊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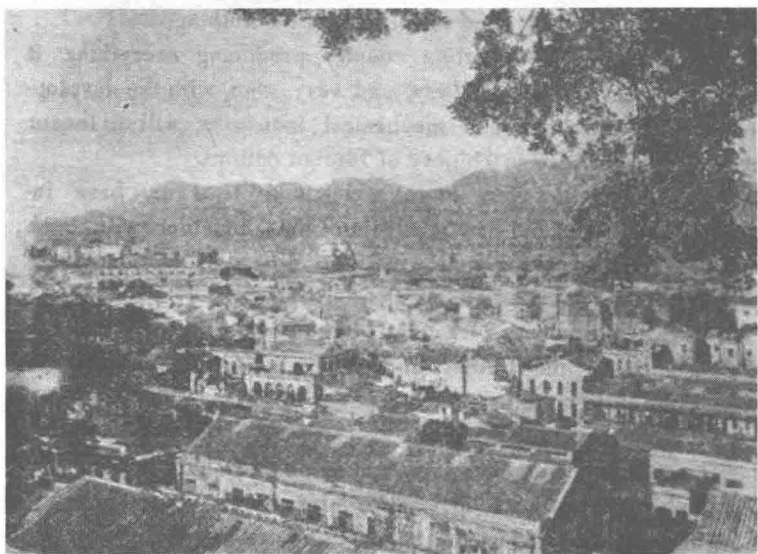
1857年《天路历程》刻本书影

去春来之际，已无人再熬制糖果，我只好改行到稻田里跟着收割的农民拾取稻穗。

这种远行，我常有姐姐陪伴。当我拾得太少时，我却不能像古时的路得(Ruth)那样有波阿斯(Boaz)的帮助。^① 可我的英文知识让我获救了。姐姐告诉那个带领大家割稻的人，说我学过英文，既能说能读，还能写。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招呼我过去，问我能否说几句“红头发人”说的话给他听听，还说那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过的一种语言。刚开始，我感到有些害羞和胆怯。姐姐从旁鼓励我，说：“等会儿他给你一大捆稻子拿回家去。”姐姐的几句撺掇之语提醒了他。他立刻变得精明灵活起来，于是对我说，如果我肯说，他就给我一大捆让我无法搬动的稻子。随后，我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念了两遍给他听。所有的农民和拾

^① 《圣经》旧约中，讲述了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时，地主波阿斯因受其人格感染，对他厚待有加，其中一天就拾取了二十二升大麦。

稻子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里，张开大嘴朝我笑，脸上洋溢着乐意。在这泥水齐膝、稻捆满地的田里结束我初次的演说后不久，我就得到了好几捆稻子的奖赏。稻子多得让我和姐姐两人都不能拖动，最后不得不找两个男孩帮忙。我满怀欣喜，扛着金黄色的稻捆回到家中交予母亲。做梦也没想到，我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英语知识竟会在我生涯中如此之早地派上了用场。那时的我仅十二岁而已。虽然路得有幸得到了六升谷子，但仍不如我。



1930 年的澳门

拾稻穗的日子很短，只不过几天而已。我的一个邻居是印刷工，他在一位天主教教士办的印刷所工作，正巧这时从澳门回来度假。他对我母亲说，那位传教士正想雇佣一个略懂英语的男孩到印刷所工作，只需能够准确辨别数字，把书页按次序折叠整理好交给装订工人就可以了。母亲说，我能担任此项工作。于是我被介绍给了那位传教士，并订